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孙正国,祝赫.民间故事面向思想史的可能性——中国仙妻救夫型故事流变的性别观念因素[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7(4):14-20.

# 民间故事面向思想史的可能性

## ——中国仙妻救夫型故事流变的性别观念因素

孙正国 祝赫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诗学意义上的民间故事,突破了神话、传说、普通民间故事的体裁区分,蕴含着深厚的思想史基础。民众在大时段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作、传承的民间故事,真挚、深沉,表现了人们朴实的历史记忆与复杂的观念变革。仙妻救夫型故事作为传承时空广远、文本储量丰富的经典故事类型,其主干情节为仙女与凡男婚恋、凡男遭遇难题、仙女帮助凡男解决难题。三个核心母题建构而成的故事异文形成了一条历史流变线索,折射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中国普通民众的性别观念变化,呈现出“父系文化认同—现代妇女解放思想—多元开放的社会性别意识”的演化趋势。研究仙妻救夫型故事流变所隐含的性别观念动因,对探索民间故事中所映射的不同时代群体性别认知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民间故事面向思想史提供了新的可能。

**关键词:**民间故事;中国仙妻救夫型故事;性别观念;思想史

**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4)04-0014-07

### 一、学术史回顾

人类婚姻史上,底层民众的社会资源极为有限,尤其是男性,他们的婚姻理想难以实现,形成了不可忽视却又无法解决的圈层化历史性困境。正是男性圈层化的历史性婚姻困境,滋养了异类婚故事的广泛生长与久远传播。其中,仙妻救夫型故事的生命力特别旺盛,其深厚意蕴值得研究。仙妻救夫型故事研究的学术史已近百年。1937 年,德国学者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收录有人与异类婚恋的故事类型。<sup>[1](P46)</sup>早期的中国仙妻救夫型故事研究尚未形成专有课题,依附于故事类型学的建构而发展。20 世纪 70 年代末,汤普森的《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将

仙妻救夫型故事命名为“313A 帮助英雄逃亡的姑娘”故事<sup>[2](P109~111)</sup>,把故事程式概括为“天鹅女(或其他超凡妻子)+女婿任务+逃亡”;此外,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将之列为 313A 型“女孩助英雄脱险”,收录古今异文 40 余例<sup>[3](P54~56)</sup>。21 世纪,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学术生态多元化,仙妻救夫型故事研究呈现出研究群体扩大、视角多样、成果丰富的局面。

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向展开。

仙妻救夫型故事的形态学研究。刘守华从故事形态、渊源角度剖析学法术型仙妻救夫故事,得出了该故事起源于汉代《有虞二妃》的结论<sup>[4](P396)</sup>;漆凌云运用普罗普的功能理论,从功能顺序与母题对应、

收稿日期:2024-04-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华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22ZD&268)

第一作者简介:孙正国(1972—),男,湖北利川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民间叙事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研究。

功能位置变化、序列组合三方面，系统解读天鹅处女型故事<sup>[5]</sup>。

仙妻救夫型故事与文化学的交叉研究。杨洪林明确提出，牛郎织女故事源于汉水流域，炎帝神农氏把农耕文明与牛郎织女故事一起传播到了东方<sup>[6]</sup>；任振河通过文献考证，认为儒家文人刘向等把牛郎织女反天命、争自由的爱情故事，篡改为劝人行孝的董永与田仙的说教，以致讹传，故事的发源地实则在山西蒲州<sup>[7]</sup>。

仙妻救夫型故事的比较研究。学者们以族别或国别为依据，考察仙妻救夫型故事的地域流布情况，比较各地区、族群的仙妻救夫型故事的内容和形态。金文学从南北文化差异和家谱学角度，比较中、日、韩三地的天鹅处女传说，得出了“难题型和七星始祖型的南方派是在以中国南部沿海和旱田耕作为中心的少数民数地域中传播”的结论<sup>[8]</sup>；徐磊用格雷马斯符号矩形分析法，对中、日“解难题”型龙女故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型体现“爱与美女神”的功利化，而日本型追求整体性的女性意识<sup>[9]</sup>。

仙妻救夫型故事的专题研究。学者们从伦理学<sup>[10]</sup>、图像学<sup>[11]</sup>、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sup>[12]</sup>等角度，对仙妻救夫型故事的内容与结构展开研究。上述的仙妻救夫型故事研究均是以天鹅处女型、龙女型、学法术型、百鸟衣型等经典类型为对象进行研究，初步形成特定的研究范畴和学术话语系统。

然而，纵观学术界对于仙妻救夫型故事的研究，可以发现，该研究在“故事群”概念建构、异文思想史的梳理方面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第一，当前学者研究该故事，往往依托于其包含的更小单位——故事类型，如天鹅处女型、学法术型、龙女型、百鸟衣型等，尚未形成“故事群”研究概念，使得研究集中于某一具体故事文本，缺乏宏观角度的整合归纳；第二，中国仙妻救夫型故事经历了时间、空间两个维度的漫长演变，其庞大的异文群可以映射出不同时代社会模式下群体性别认知的观念变迁。以中国仙妻救夫型故事作为研究对象，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普通民众的性别观念史，对考察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性别思潮变迁，建构故事学的思想史面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 二、中国仙妻救夫故事群的经典类型与叙事意义

仙妻救夫型故事在中国民间故事史上富于奇幻

色彩，具有悠久的文本历史和稳定的故事结构，可看作一个大型故事群。以故事群中天鹅处女型、学法术型、百鸟衣型、龙女型四个类型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为切入口，运用格雷马斯的行动元矩阵模式，分析归纳行动元之间的逻辑关系，重新厘定中国仙妻救夫型故事的女性言行与女性观念，进而揭示出隐匿在故事文本内的普通民众性别观念。

### （一）仙妻救夫故事群的经典类型

中国的仙妻救夫故事群蕴含着丰富的经典文本，包括天鹅处女型、学法术型、百鸟衣型、龙女型四个类型。

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在不同地域、族群都广泛流传，其发展脉络呈现出明显的史学特征。刘守华将天鹅处女型故事分为四代异文：第一代异文，人类与飞鸟结合，属于图腾婚始祖神话；第二代异文，《毛衣女》出现藏衣成婚和仙女得衣离去的情节；第三代异文的天鹅处女型故事对仙妻离开后的情节进行续写，玉皇上天寻找仙妻的女婿施加考验，丈夫在仙妻的帮助下取得胜利或斗争失败；第四代异文，故事情节融汇战争与宗教因素，展现出广阔的社会面貌。<sup>[13]</sup>在第三代异文时，故事已经具备“仙女与凡男婚恋”“凡男遭遇难题”“仙女帮助凡男解决难题”三个基本母题，并构成完整的故事链，中国仙妻救夫故事群中的天鹅处女类型基本定型。天鹅处女型故事的发展动态体现出从远古到近代社会模式的嬗变，呈现了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再到父权—夫权制的发展脉络。在社会模式的变容中，群众性别认知也随之变化，“藏衣成婚”的情节体现了底层男性的婚恋需求和对女性的禁锢，隐喻男性在生产生活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则沦为了“继祖传嗣”的机器。

学法术型仙妻救夫故事在山东、广西、湖南等地都有异文流传。该类型将道教人物广泛引入故事，蕴含浓重的宗教色彩。故事往往以男子上山向张真人、李老君、茅山道人等道教人物学法术开头，男子与法师之女相爱却被法师阻挠，法师为男子设下多重难题，法师之女帮助男子解决难题，并运用法器与男子远走高飞。清代文人沈起凤在笔记小说《谐铎》的《奇婚》篇中引用该类型故事，将仙女形象分为一正一邪两个姐妹，安排正义的妹妹帮助男主角摆脱邪恶的法师一家，原本邪恶的姐姐脱离法师的掌控后弃暗投明，最终二女共侍一夫。沈起凤对民间故事的改写中暗示了清代封建统治者对白莲教农民起义的镇压，同时也传达出他作为男性作家的隐秘心

理,即男性成为故事的中心,呈现“一男得双美”结局模式,表现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男权本位思想。

百鸟衣型仙妻救夫故事是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中的重要亚型,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将之列 为 AT465A 型,其情节单元为:农民妻子因美貌被国王强征入宫;妻子离开前嘱咐丈夫制作百鸟衣;丈夫用百鸟衣换得龙袍,夺回妻子并成为新国王。<sup>[3](P101)</sup>该类型起源于我国先民的鸟崇拜文化,并在不同地域、族群风土民俗的影响下分化出多样的情节单元。以各地异文的母题形态特征为参照,可以将百鸟衣异文分化为汉族百鸟衣故事圈(汉族亚型)和多民族故事圈中的动物化人亚型、传统民俗亚型,其中动物化人亚型百鸟衣故事属于仙妻救夫故事群。在百鸟衣型仙妻救夫故事中,国王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是父权文化的象征。男主人公在仙女的帮助下杀死国王成为新王,在弑父的过程中实现了权力的更迭,却并没有脱离“皇帝轮流做”的封建社会运作模式,隐喻父权制的重复与强化。

中国民间故事史上龙女与凡人的婚恋故事很早就被中华民族所津津乐道。刘守华在丁乃通归纳的龙女型故事基础上增加了“龙女与凡人婚配”这一亚型<sup>[4](P385)</sup>,故事链包含“龙女爱上人间的穷苦男子”“龙王阻挠或人间的国王意图霸占龙女而给男子出难题”“丈夫在龙女的帮助下解决难题”三个母题。解难题型龙女故事往往与百鸟衣型故事和田螺女型故事复合,与前者复合以表达对封建统治者强抢民女的愤怒,与后者复合以隐喻底层穷苦男子的婚恋需求。龙女形象的塑造,强化了女性的神性来源,蕴含了男权时代对母系社会的历史记忆与崇敬心理。

综上所述,中国仙妻救夫故事群中四个亚型的故事情节十分相似,但母题枝干仍有较大差异,需要从性别观念史上对其同质性与差异性进行进一步分析,探讨表层故事语境下的深层结构与意义。

(二)仙妻救夫故事群的深层叙事意义

A.J.格雷马斯是国际知名的结构叙事学家,他对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加以改进,创建了四元结构的行动元矩阵模式。<sup>[14](P64)</sup>仙妻救夫故事群的经典类型中有三个稳定的行动元,即仙女、丈夫和设置难题的恶人。其中,“丈夫”还可以根据其人物功能的不同,分化成“丈夫<sub>1</sub>”与“丈夫<sub>2</sub>”。建立仙妻救夫故事群的符号矩阵,可以对人物形象进行深入分析,解构文本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阐释故事表层语法后的深层意义。通过对中国仙妻救夫经典故事类型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行动元矩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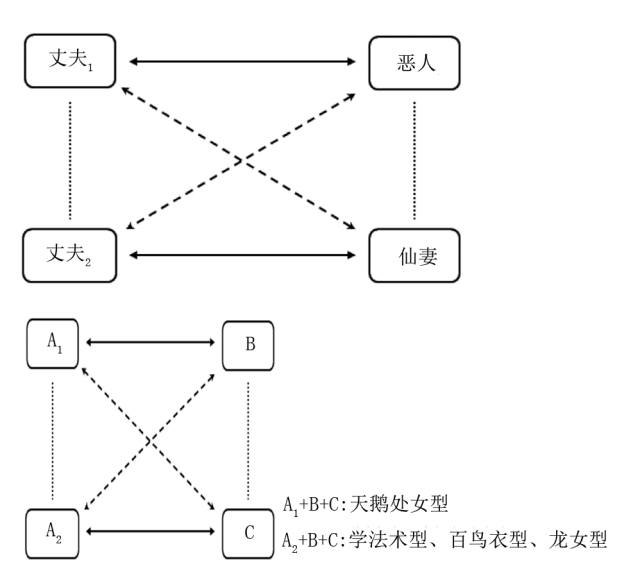


图 1 仙妻救夫故事群行动元矩阵

在该行动元矩阵中,用 A<sub>1</sub> 和 A<sub>2</sub> 分别指代“丈夫<sub>1</sub>”和“丈夫<sub>2</sub>”,B 指代“恶人”,C 指代“仙妻”。A<sub>1</sub> 与 B、A<sub>2</sub> 与 C 之间是反对关系,A<sub>1</sub> 与 C、A<sub>2</sub> 与 B 之间是矛盾关系,A<sub>1</sub> 与 A<sub>2</sub>、B 与 C 之间是蕴涵关系。矩阵中共有两组完整的行动元序列。一是“A<sub>1</sub>+B+C”,该序列代指天鹅处女型等丈夫与仙妻之间有显著夫权矛盾的故事。丈夫与仙妻之间是矛盾关系,丈夫通过藏衣迫使仙女与之成婚,仙妻在得到羽衣后离去的情节展示了婚姻悲剧中两性关系的失衡;恶人与仙妻之间是蕴涵关系,即“如果恶人提出难题,则仙妻帮助丈夫”;而丈夫与恶人间对立但不构成矛盾,喻指丈夫(在仙妻帮助下)解决恶人难题的反对关系。二是“A<sub>2</sub>+B+C”,该序列包含学法术型、百鸟衣型、龙女型等经典仙妻救夫故事。丈夫与仙妻之间是反对关系,虽然他们处于封建社会夫权制婚姻下,但与天鹅处女型故事不同的是,这三类故事的仙女主动追求男子,且不存在“离去”这一行为,因此可以看出女性在家庭中没有因夫权问题产生激烈矛盾;丈夫与恶人多为矛盾关系,如搜集到的 33 篇百鸟衣型仙妻救夫故事中,国王死于男主人公或仙女之手的异文达 25 篇;恶人与仙妻之间仍是蕴涵关系,仙妻的救夫行为需要恶人难题的驱动。

经过上述逻辑分析可知,两个故事序列的区别取决于“丈夫”这一行动元居于符号矩阵的位置。那么为何在“仙妻救夫”这类看似女性处于主导地位的故事中,故事的走向竟由男性决定?这就涉及到故事文本之下,隐匿于民众群体认知中的深层文化观念。康丽提出,解读文本中文化观的方式有两种:第



一方式,当文本中传达的文化观念更接近现实生活的实际层面时,将这种观念的表达正向性地理解为民众对现实生活的考量;第二方式,当文本中传达的文化观念悖反于现实生活的实际层面时,反差部分既可以看作是民众在其渴求被严重抑制和禁锢的情况下所透露出的反抗或挑战,也可以看作是以逆向的表达方式强调了对社会现实运行规范的认同。<sup>[15]</sup>作为传统社会民众文化表达的结果,仙妻救夫型故事的讲述势必要将社会性别认知纳入其中,但为何会以“女性胜利”这种看似与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现实相背离的方式呈现出来?在性别规制鲜明的传统社会,这种故事讲述的真是既往学者所判定的“反叛”与“挑战”吗?<sup>[15]</sup>站在与学界以往论断对话的角度,探究仙妻救夫型故事中的性别规制,有利于发现故事真相,厘清民众性别思潮的流变。

### 三、仙妻救夫型故事中的性别规制与伦理冲突

中国仙妻救夫型故事所描写的“仙妻替夫解难题”情节彰显了民间女性的勇敢与智慧,但是通过分析故事文本,已然发现“女性胜利”只是一种表象,仙女始终被遮蔽在夫权和父权文化的双重阴影下。回到文本的三个行动元,在天鹅处女型故事序列中,仙女的人物功能中包含“离去—回归”的行动轨迹,表现出女主人公身份从“仙女”到“凡妻”的地位沉降。仙女与凡男之间存在封建社会固有的夫权矛盾,而面对共同的敌人时,仙妻选择回归家庭,与丈夫共同抵御象征父权文化的恶人。但仙女解决问题后并没有成为直接的受益人,而是沦为她的丈夫——新一任“父”的附庸,被父系制度再度桎梏。所以仙妻救夫型故事实则是“以逆向的表达方式强调对社会现实运行规范的认同”,张扬女性智慧的表层声音与叙述伦理规范的隐秘声音共同杂糅于故事文本中。

#### (一)离去与回归:仙女到凡妻的地位沉降

在天鹅处女型仙妻救夫故事中,仙女的行动呈现出“离去—回归”的稳定趋势,那么仙女为何会从高傲神女沦为朴素凡妻?要解答这一问题,需要追溯故事文本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即通过叙事情节捕捉其中附着的民众性别认知的变化,从而探明历史语境下讲述者令仙女变为凡妻的原因。

首先,仙女的“离去—回归”是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的必然结果。回到“妻的离去”这一母题的由来,仙女因男子“藏衣”失去法力,不得已与之成婚,却时刻在寻找机会取回羽衣。刘守华将“藏衣情

节”解释为“男子将女子的宝物藏起以割断女子与娘家的联系,反映了‘从妻居’向‘从夫居’的婚姻转型过程”<sup>[13]</sup>。如前文所述,第二代的天鹅处女型故事往往以“仙女取衣离去”告终。“仙妻能够离去”说明民众处于由女性主导的族外婚向男性主导的对偶婚的思维转化阶段中。然而第三代故事开始增添丈夫追寻妻子,妻子回归家庭、替夫解难的情节。可见此时“‘从妻居’这一页不可挽回地翻过了”,向“从夫居”的过渡已经完成,家庭私有制以及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权力制度都逐渐形成。因此,从社会运作模式的发展态势来看,仙女身份的沉降带有线性史观的必然性,即在以夫权为中心的婚姻伦理下,仙女嫁给凡男并完成了“继祖传嗣”的使命,她已然为娘家所不容,回归夫家成为其唯一的选择。

其次,仙女地位的沉降迎合了传统社会故事讲述者的心理期待。民间故事作为劳动者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集体文学形式,总是传达着民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对于一个婚恋故事来说,讲述者反映的无外乎是婚恋与繁衍的需求。凡男通过“藏衣”这种充满侥幸和不劳而获意味的形式获得了美丽的仙女妻子,这种叙事情节迎合了底层男性的潜在性欲求。仙女与凡男在婚配之后身份转化为仙妻与凡夫,这个由男女而夫妇的过程,意味着父系社会对女性作为独立性别角色的侵蚀与消解。“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sup>[16](P416)</sup>,“夫妇之序”被视作“人伦之始”,由“夫妇”延展包括“父子”“君臣”在内的一套等级有序的中国古代社会统治伦理。《礼记·大戴》和《论语》将“妇”的内涵释为“伏于人者”“服也”,“夫妇”的出现宣告着父系社会完成了对女性的历史性压抑。

夫妇间的伦理秩序往往通过男性对话语权的操控在现实生活中强化,具体表现为“妻与己齐”“夫为妻纲”等包含附会意义的陈述。以仙妻救夫故事为例,叙述者意识到仙妻凡夫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打破了“妻与己齐”的双边匹敌关系,因此仙妻身份的沉降已成必然。同时,他们又意识到凡夫作为一介凡人不能直接参与到与恶势力神仙的斗争中,于是“在男性庇佑能力匮乏的情况下,为了渡过家庭的利益危机,仙妻暂时抛开社会规范对传统女性的性别约束,作为男性家庭的代言人与恶人较量并解决困境”。然而危机一旦消除,仙妻就要立刻遵守封建伦理规约,沦为传统社会性别尺度下的凡妻。经考察,仙妻的结局序列分为两大类。其一,丈夫功

成名就后退场(为董永偿完债务,凌空而去;自废织纫之功,被帝责归河东)。其二,成为贤良妻子(成为王后;辅佐丈夫,平淡生活)。一方面,仙人两隔的结局可以看作是普通民众对错位伦理关系的纠正;另一方面,仙女地位的沉降体现了她对凡间社会性别规范的服从,可以理解为叙述者对以夫权为中心的伦理法则的重申。

## (二)恶人难题下的父权语境

在以孝悌为主流文化的中国传统社会,父权秩序始终占据群众的性别认知高地。直至辛亥革命“弑父”行动的完成,居于封建社会权力巅峰的统治之父——皇帝及整个封建秩序才真正从历史中退场。在中国仙妻救夫型故事中,恶人的身份包括:仙女之父(法师、天神、玉皇);妖怪(蜘蛛精、巫师);国王(土司、皇帝)。其中,仙女之父、国王两种角色有着天然的父权文化印记。自恶人提出难题开始,仙女与凡男之间的夫权矛盾开始转化为夫妇与父权之间的矛盾。百鸟衣型、龙女型、学法术型故事往往以夫妻胜利,恶人失败,丈夫接续“父”的位置告终。为了突显夫妻二人打败压迫之父的勇敢与智慧,在江苏灌云流传的《绣牡丹》<sup>[17](P43~53)</sup> 故事中甚至出现了仙女“弑父”的母题。“弑父”母题在西方文学史上由来已久,从赫西俄德的《神谱》到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西方自古便不避讳对“弑父”的讨论,因此西方的仙妻救夫型故事中出现“弑父”母题也不足为奇;但是将其放在贯穿着宏大父系秩序的中国文化史中,“弑父”母题的出现完全悖反于现实生活的实际层面。

同时,值得深思的是,此处的“弑父”与现代文学的“弑父文学”是否具有相同意涵?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提出,“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自父系秩序建立以来第一个绝无仅有的弑父时代。”<sup>[18](P3)</sup> 从“弑父”的目的来看,“五四”的“弑父”推翻了以“父亲”历史为唯一书写对象的中国封建时代,而中国仙妻救夫型故事中的“弑父”仍然没有脱离“子承父业”的父权语境。在学法术型故事《张朱二郎和花梨小姐》<sup>[19](P141~150)</sup> 的结尾处,张朱二郎为了避免太上老君加害,上表玉皇大帝与太上老君讲和,玉皇大帝相劝道:“你有女无儿,法坛和法师无人继承,这女婿正好继承岳父之业”,于是张朱二郎继承了太上老君的法师地位。由此可见,“弑父”之于仙妻救夫故事只是“子代”争夺权力话语的工具,“弑父”是为了成为“父”,而非结束父权时代。

## 四、思潮流变下的性别心态:从古代经典故事融入现当代作家文学

两千年父与子的权力循环中,女性一直扮演着父权秩序中的“他者”形象,有生命而无历史。随着近现代妇女解放思想的兴起,中国新的意识形态领域逐渐认可了不是“妻”“妇”等“从人者”意义上的女性和女性行为。五四运动以来,“鸳鸯蝴蝶派”作家开始把仙妻救夫型故事引入到小说的创作中,将第一批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精神特质附着在现代织女形象的塑造上,从“个性解放与婚恋自由”的角度重写牛郎织女故事。20 世纪 80 年代,又有“先锋派”作家融合都市社会心态与当代摩登女性特征,以反思古典爱情陨落的视角对仙妻救夫型故事进行了大胆改写。中国仙妻救夫型故事从古代故事走向现当代文学,揭露出女性从隐于权力秩序之下到浮出历史地表,最终在新时代获得平等权利的民间性别思潮变化态势。

### (一)五四文学中的仙妻救夫型故事

颠覆封建礼教秩序的五四时代,是中国女性真正的诞生期。反封建、反传统的新文化养育了一代以“人道主义”“个性解放”为旗帜的新女性,她们走出家门,否定既往的社会性别规约,背叛旧女儿的角色并争取自由。<sup>[18](P29)</sup> 这些新女性离经叛道的勇气与争取独立的智慧,已然成为五四文学思潮的一部分。在妇女解放风尚的浸润下,社会性别心态逐渐转变,人们普遍认识到:妇女已经从物体、客体、非主体的角色中剥离,成为具有独立所属格的“我”。即使是“五四”激进文人所鄙弃的守旧派作品和通俗文学,也隐匿着性别思潮的流转。

1922 年,“鸳鸯蝴蝶派”作家李涵秋主编的旬刊《快活》(第 15 期)设置“七夕特刊”一栏,刊载了张碧梧、赵赤羽、范烟桥等作家以牛郎织女故事为蓝本创作的现代通俗小说。几位作家对故事的改写角度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涉及到新型社会运作模式与现代性别思潮,以充满奇幻色彩的手法刻画五四新文化对牛郎织女生活的影响。在张碧梧的《牛郎织女团圆记》中,织女与天帝针对亲权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sup>[20]</sup>

中国仙妻救夫型故事中的织女经历了两千年“从人”“服人”的过去,在五四时代终于从“父亲的女儿”走向“我是我自己的”。织女以性别主体的身份对亲权与父权发难,并且揭开封建礼法的遮羞布,将现代女子对情与爱的欲求大胆暴露于日光之下。张

碧梧有意揭露与纠正封建父权对女性的迫害:“我当初顺从父皇的旨意,和牛郎一年一会,原是我一时胆怯,就屈服于亲权之下。如今我是觉悟了,再不能受父皇无礼的压迫。”<sup>[20]</sup>可见妇女解放思想在当时已呈势不可挡的线性发展态势,当女性用“己”这个反身代词直呼自己并表明自身的自我所属格时,“妻与己齐”的时代已然成为过往云烟。除了亲权,织女还谈到人权与婚姻的问题。五四新文学家借织女之口,将封建等级秩序与父权制一夫多妻婚姻打入历史的尘埃,取而代之的是“人人平等”与“婚姻自由”的宣言。20 世纪这些处于新旧文化转型时期的通俗小说家将古典故事改编为孕育着新思想的现代文学作品,表达他们对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的看法与观点。虽然他们的观点存在乍新还旧的情况,如赵赤羽的《瞒过了天老爷》<sup>[21]</sup>中牛郎以“多娶一门姨太太”为由胁迫天帝更改“一年一会”的规制,但仍不失为时代之新声。

## (二) 先锋派作家对古典故事类型的戏仿

20 世纪 80 年代,陈思和与王晓明掀起一场“重写文学史”的文艺思潮,力图摆脱国家意识形态写作模式,通过民间文化形态、潜在写作现象等学术实践,以审美化、个人化的视角,创作具有启蒙性和现代性的新文学。陈思和提出的“民间”话语为 20 世纪 80 年代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创作维度。“他的民间概念并不侧重于说明什么是真正的民间文化,而重点在于知识分子以启蒙的姿态进入民间,让它成为再度言说启蒙话语和启蒙精神的人文空间以填补现代性空间。”<sup>[22]</sup>在“走向民间”思潮的影响下,后先锋派作家李冯以经典文本为材料创作了一系列戏仿小说,如模仿《牛郎织女》的《牛郎》。

戏仿指对传统文本进行颠覆性创作,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写作策略之一。戴锦华曾评价道:“或许可以说,是李冯的类似作品成就了所谓后现代的‘复制’实践。”<sup>[23]</sup>李冯的戏仿小说打破经典故事的原本立意,消解时空的古今界限,将当代思维植入到对古代人物的塑造中,以达成关注人的精神与心态的目的。《牛郎》的前文本是中国经典民间故事《牛郎织女》,李冯安排牛郎穿越到世纪末的中国,曾经高高在上的星君从“神”降格为街上游荡的平庸之辈,与凡人一同经历经济、婚姻的困扰。当代织女受到现代浮华社会的影响,从忠于爱情的古典神女变为追名逐利的都市女郎,“亲爱的,每当我想到当年我抛弃了事业前途嫁给你的那段往事,总有些后悔。那时,我太冲动、太年轻,也太把爱情当一回事了”<sup>[24]</sup>,

折射出当代女性的婚姻观与爱情观。都市女性的心态已经度过脆弱的浪漫幼年而进入一个懂得冷酷与怀疑的成熟期,她们骄傲洒脱、志得意满、追求成就,对名利有着赤裸坦荡的欲望。都市女性的心态发展与社会转型是同步发生的,因此她们不会再重蹈五四文学中章秋柳、孙舞阳等“新女性”的悲剧命运。复古的牛郎虽为凡身,却保有古典神性,执着地遵守“一年一会”的惯例,即使他们已然分居;前进的织女则摇身变为看重现实利益的凡人,性别思维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他们浪漫爱情的枯萎。李冯塑造了失意的牛郎与得意的织女形象,以世纪末古典织女精神的陨落来暗讽人间已经失去古典爱情的神性,将罪责归于当代织女。

20 世纪 80 年代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五四时期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同情的成分尚有,但大多数已由于时代的变迁、男女社会地位的变化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妇女政策等一系列错综交叉的原因而变得更为复杂。在反抗主流意识形态和性压迫的同时,男性作家又表现出了“厌女”的倾向,男性主体意识无意识地通过他们笔下的人物流露出来。诚然,男性作家的创作中因诸多复杂缘由,存在以自我为意识形态中心的惯性思维,但是在经济改革的新形势下,民间对妇女问题持续关注,女性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近年来出现的女性理论和建立在社会科学基础上的妇女学热潮,表明多样化的女性主体位置已在中国社会出现。

## 五、结语

中国的仙妻救夫型故事经历了从古代故事到现当代文学的转型,仍然保持着生生不息的发展态势,这是因为不同时代的文本中蕴含着群众的性别心态认知流变。仙妻救夫型故事作为民众的思想载体,它见证了中国从封建王朝走向民主共和的现代国家,也汇聚着千年来中国妇女有喜有悲、有起有伏的文化记忆与性别情绪。这些存在于历史边缘的记忆和情绪常常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忽视,却真切地记录着民间的伤痕与憧憬。民间故事是民众表现生产生活、情感价值的表层语法,文本中蕴含着人们关于社会的更深层思考。诗学意义上的民间故事,突破了神话、传说、普通民间故事的体裁区分,蕴含着深厚的思想史基础。民众在大时段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作、传承的民间故事,真挚、深沉,表现了人们朴实的历史记忆与复杂的观念变革。仙妻救夫型故事作为传承时空广远、文本储量丰富的经典故事类型,主干



情节为仙女与凡男婚恋、凡男遭遇难题、仙女帮助凡男解决难题。三个核心母题建构而成的故事异文形成了一条历史流变线索,折射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中国普通民众的性别观念变化,呈现出“父系文化认同—现代妇女解放思想—多元开放的社会性别意识”的演化趋势,中国仙妻救夫型故事因此具有了证史价值。也可以说,研究中国仙妻救夫型故事流变所隐含的性别观念动因,对探索民间故事中所映射的不同时代群体性别认知的观念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民间故事面向思想史提供了新的可能。

参考文献:

[1](德)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M].王燕生,周祖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2](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M].郑海,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3](美)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M].郑建威,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漆凌云.中国天鹅处女型故事的形态学研究——以基本功能、序列及其变化为中心[J].民间文化论坛,2006(5).

[6]杨洪林.汉水、天汉文化考——兼论《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源流[J].武当学刊,1993(4).

[7]任振河.舜居妫汭是“牛郎织女”爱情故事的发源地[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8]金文学.中国日本韩国天鹅处女传说谱系比较研究[J].社会科学

辑刊,1994(6).

[9]徐磊.中日“解难题”型龙女故事比较——以格雷马斯矩阵分析为中心[J].文化遗产,2015(2).

[10]冯娟.性别伦理视域下“仙女救夫”的女性审美[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7(2).

[11]苗春燕.当代网络空间中的牛郎织女图像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22.

[12]李丽丹.18~20 世纪中国异类婚恋故事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13]刘守华.纵横交错的文化交流网络中的“召树屯”[J].民族文学研究,1990(1).

[14](法)A.J.格雷马斯.结构语文学[M].蒋梓骅,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15]康丽.性别制约与规范重叙[J].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5(2).

[16]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7]林兰.云中的母亲[M].上海:北新书局,1933.

[18]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19]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M].北京:中国 ISBN 中心,1989.

[20]张碧梧.牛郎织女团圆记[J].快活,1922(15).

[21]赵赤羽.瞒过了天老爷[J].快活,1922(15).

[22]韩振江.在现代性的紧张中重读陈思和的“民间”[J].当代作家评论,2010(4).

[23]戴锦华.拼图游戏:花城 1996[J].花城,1997(3).

[24]李冯.中国故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